

早期人民广播的仪式化传播刍议*

杨璐¹, 景盛泉²

(1.昆明理工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2.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 江油 621709)

【摘要】广播在二十世纪初叶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巨大影响力。人民广播起步虽然略晚,但却因无产阶级与广大百姓及传统民俗内在的贴近性,开创了仪式化传播的先河,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巨大的凝聚、整合和动员作用。其仪式化的制作方式和接收实践,为后继的电视仪式化传播树立了标杆,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关键词】仪式化传播; 人民广播; 早期

【中图分类号】G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2-0147-04

仪式是文化的核心和缩影,与人类生活具有同构性。“仪式化”是指某种类型化的、重复的姿势和姿态。^①“仪式化传播”是就传播的仪式性而言的,也即“作为仪式的传播”。主要指传播在主题、内容、类型、方式、时间及场景等方面都与仪式展演类似。它并不一定作为仪式本身成立的严格限定,可能仅仅具备传统仪式在形式或功能上的某些特征,比如狂欢、游戏、表演、反复、净化、规约、通过、治疗、形式、禁忌等等。

1940年春天,人民广播才随着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筹建而诞生。早期(特指解放之前)的人民广播主要针对敌后根据地军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日本侵略军,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国民党军队。在极其不利的战场环境和战时动员中,人民广播将仪式化的传播方式,贯彻到了制作、播出和接收的各个环节之中,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和事件上,显露出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其经验值得总结。

一 播音员的情感投入与仪式氛围的营造

与单纯的信息播报不同,广播的仪式化生产首先需要建构一种仪式性的氛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早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局面,再加之进步报纸媒体在国统区一度被封锁,因而迫切需要当时最新型的大众传播手段——广播,来激发出对敌官兵、根据地和敌后民众必胜的信念,将各式各样的听众团结、凝聚起来。在这种情形下,播音员和祭司的角色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类似,即都需要将“广播”这场现代仪式的参与者们带入热烈的情感氛围之中。

邯郸台的播音员纪清在回忆播音经验时回忆到:“陕北台在播送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靖边县王家湾收听后称赞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

真是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②纪清的总结一语道破了播音员进行仪式化播报的核心,那就是要结合稿件内容,将我方的态度、立场和情绪附着于播音的过程之中,用自身声音的语气、语调、节奏等形成强烈的感染力将听众带入激动人心的情感氛围之中。这样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是与国统区播音大为迥异的。

根据鹿野的回忆,他曾在国统区和恽逸群就广播问题进行过交流。恽逸群作为一个“广播爱好者”,对于广播的历史和当时广播流行风格比较了解,他曾直率地对陕北台提了许多意见,其中一条就是认为“陕北台娱乐性的内容太少,宣传气味太浓,太生硬,太不冷静,不够含蓄,有时是厉声厉色,旁若无人,实在使听众难以接受。”因而,恽老提议广播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的主要特点是“短、浅、软”。他说,“短,大家都晓得了;浅就是通俗,使人一听就懂,软就是轻松、风趣,使听众在文化娱乐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你的观点。”^③

然而,恽逸群并未意识到,客观化的报道方式对于仪式化传播来说是不合适的。他所提的建议并未得到执行,另一个播音员齐越更是因为较为平和、中立的播音风格,而受到了批评。应该说,仪式化传播的方式在当时的采用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是一种潜意识下的合理选择。

二 播音内容的“净化”与神圣感的树立

在许多仪式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那就是“净化”,通过“水”、“火”等带有灵力的物质对献祭的物品进行反复清洁,从而赋予祭祀物某种程度的神圣性。与洁净仪式相类似,在广播仪式中同样有“净化”的程序,那就是对广播内容精度的严格要求。播音文稿的重要性和级别越高,播音时口误率

收稿日期:2012-04-28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规划项目《电视新闻仪式化传播机制研究》(项目号:2010Y410)。

作者简介:杨璐(1982-),女,四川绵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文化人类学。

的要求也就越高。对于某些重要的稿件,甚至要求“不要播错一个字”。

当他们接到《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的播出任务时,齐越被告知:“‘毛主席指示: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14]在纪清的回忆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重要的文件不能播错一个字,已经成为一条默认或成文的法规:“邯郸台的领导对播音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像上面提到的重要文献或社论、重要新闻等,播出时都要求一字不错。”^[15]

在当时播音员素质和播音条件下,“一字不错”的要求不应仅被看成是对准确性的高度把控,或者对播音质量的洁癖般的喜好。它的提出是和文章撰稿人的级别以及文稿想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心理效果紧密相连的。对于关键性广播稿的精心打磨和在播出时“绝不能错一个字”的要求,正是希望该广播作品以完美无瑕的姿态呈现。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从深层次上反映了传媒文本的生产者希望在受众心中营造出特定传播内容的权威与神圣感。这样的要求逐渐形成传统,在后来的电视新闻播音上延续下来,这又是后话了。

三 节目的精心编排与仪式的程序设定

程式化是仪式非常显著的特性,指仪式的各项内容需按特定的时序次第进行。与之类似,广播的节目内容也是由各种声音素材在时间的一维性上逐步展开的。广播节目借由编排而产生的顺序性与仪式的程序性就形成了暗合。通过对节目的精心编排,广播仪式要着重传播的某些积极内容会通过时间流程的预演、反复、总结来进行强调、突出;而某些禁忌性内容则可以通过压缩或取消进程来遮蔽。因而,广播可以根据时势需要,成为积极、消极、加冕及哀悼等不同类型的仪式。

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主席重要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广播发布,就是一个积极的加冕仪式。陕北台的工作人员提前很多天,就投入到学习、播出这篇文件的紧张准备中来。“这个报告有九千多字,分八个部分。从元旦这天起,接连三天,每天用普通速度全文播送一遍。从一日到五日,每天还用记录速度分段连续播送全文。六日,由钱家楣同志用较慢速度连标点符号一起又将全文播送一遍,供抄收者校对。另外,四日、五日两天,还用英语播出了这个报告的译文。”^[16]通过预告、重复、慢速播出和英语播出,这份重要的文件不仅得到了较为准确的传播,还在一定时间段内取得了极为显要的仪式性地位和效果。

而在另一些事件中,广播编排则是通过减少、甚至削减某些内容,来渲染哀悼仪式的氛围。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二日,王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等同志从重庆乘飞机赴延安的途中,不幸遇难牺牲。“作家肖军、丁玲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电台编辑部,要求自即日起停止播送文化娱乐节目,以纪念终身为中国人民民主自由和平奔走呼号而牺牲的伟大先烈。为此,张家口台自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三天中,停止播送文化娱乐节目,以示沉痛哀悼。”^[17]

在纪念王若飞、叶挺等人的广播哀悼仪式中,对文化娱乐节目的减少和停止播送,正是传统文化习俗在广播仪式中的渗透与变形,即通过对特定内容的抑制,在观众心中转达和唤起尊崇的情感,从而产生强劲的心理力量来疗治人们的哀伤。

四 受众积极的仪式化接收和参与

仪式不仅需要组织者,更需要参与者。广播作为仪式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流散仪式,是利用电波的快速传播突破了距离,将不同空间的人们,整合在同一个时间流程之中。因而广播仪式的生产者和仪式化接收的受众在广播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是紧密相连的。通过这一次次的虚拟联系,拉近了传者与受众的距离,使听众与播音员及其代表的电台产生情感的交融、形成归属感、认同感,进而构筑起想象的共同体,甚至直接导致了态度、立场和日常行为方式的转变。

首先,受众在收听过程中积极地进行了情感分享,鼓舞了胜利的决心和斗志。早期的人民广播,与其覆盖范围内的听众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们不仅从广播中获知信息,更通过收听广播的行为和远在千万里之外的播音员及其背后代表的党中央,进行着强烈的情感共享和依赖。我们通过分析从北平、南京、昆明、重庆等地突破重重封锁反馈到各个电台的听众来信、报纸对收听情况的报道和当事人回忆录可以略知一二。

许多听众通过信件热情地告诉电台,他们是如何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收听延安的广播的。一九四二年,党中央收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师生和学生联合会写来的热情洋溢的反映收听到延安语言广播的信,信中表达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边远地区,收听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送的新闻和社论后的喜悦心情,把广播比作“黑夜里的一盏明灯”^[18]。对于远在边陲的联大师生们来说,收听人民广播的情感共享意义或许早就超越了单纯信息获取的范畴。这一点,在下面的例子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据陈海峰的回忆,他们在转播延安新华广播电

台节目的时候,因为延安台的发射功率小,国民党和外国电台的功率大,对延安台的信号干扰很大,收转十分困难,只能听到杂音,连播音员的声音也是断断续续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时只好请领导批准暂不转播,改放一会唱片。这种在信息传递和获取的效用视野下看,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做法,却受到了听众打来的电话责问:“转播延安电台的时间,你们为什么放唱片?”当陈解释转播信号太差,听不清时,听众说“听不清说什么没有关系,只要是延安的声音,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听着心里就踏实。”^[9]

因此,对于国统区的人民来说,冒着生命危险收听信号极差、几乎很难听清的人民广播,与其说是为了获取信息,不如说更是一种用生命、情感和行为来进行的广播仪式参与,而在这个仪式中,电波附着了神奇的魔力,将他们与心里憧憬的“党中央”以及遍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同志们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哀乐。这对于能够集体收听的受众来说,表现得更加突出。在陕北电台广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播出的时候,我军某部的报务室被干部、战士、通讯员、炊事员围了个水泄不通。连沉静寡言的组织科副科长吕德胜同志也兴奋地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地委、分区驻地军民一片欢腾。^[10]

其次,受众在收听过程中累积了深厚的认同感,触发了阶级立场和行为方式的转变。经过一次次的广播仪式洗礼,不仅能将我方天南海北的军民每天定时召集起来,共享情感,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国家、阶层的民众、官兵,最终重塑了他们的思想认同,甚至改变了其行为方式。

在广播导致的情感认同对象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播音员。根据恽逸群的介绍:“香港大中學生、教

授、店员、工商业资本家中的许多人都冒着风险,收听陕北的广播;南洋新加坡、文莱、沙捞越的华侨同胞,收听陕北广播的人也很多。恽老说,一个叫做曾美玲的新加坡的华侨女中学生,从十六岁开始就收听陕北台的广播。在广播的影响下,后来,她背着父母,冒着生命危险,经香港、广州、桂林,辗转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因为她经常收听陕北的广播,竟熟知每个播音员的音调,还在广播里学会了唱《兄妹开荒》。”^[11]一九五〇年夏天,一位在上海做了多年地下工作的我党党员来北京时,专门到中央合来看望在延安台、陕北台工作过的播音员。她一见面就紧紧拉着播音员们的手,热泪盈眶,激动地感谢他们播出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使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新年。还有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国民党军官刘善本,正是因为长期收听人民广播,最终驾驶飞机,飞向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延安。到了延安之后,他也专程来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想要“看看这真理的播种机,感谢她们和他们把我们这一叶扁舟推到了人民的岸上——革命圣地延安。”^[12]

结语

考察早期人民广播的仪式化传播,我们发现,在广播文本的制作、传播还是接收过程中,很多时候生产者和接收者对广播的理解和运用都不仅停留在信息“提供——获取”的功利效度上,而是一种有着巨大的情感卷入的仪式化目的与行为。其中,政治、技术和文化因素是早期人民广播仪式化传播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几者产生的合力,使广播仪式参与的主体在直播过程中交换象征符码、交融情感、实现认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广播作为一个中介,被传受双方互相神圣化,最终产生了超越工具性的价值。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A].(上)[C],P26-27.
- [2]纪清.邯郸台播音工作散记[A].中央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一册)[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51-152.
- [3]鹿野.陕北台记者生活回忆[A].中央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一册)[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26-127.
- [4]齐越.播音员日记——解放战争年代的播音工作[A].中央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一册)[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10-111.
- [5]纪清.邯郸台播音工作散记[A].中央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一册)[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53.
- [6]齐越.播音员日记——解放战争年代的播音工作[A].中央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一册)[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08.
- [7]丁一岚等.张家口(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始末[A].中央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一册)[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43-144.
- [8]丁戈.听到我们自己的广播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时期二三事[A].中央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一册)[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32.

- [9]陈海峰.我走上广播工作岗位以后[A].中央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一册)[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84-185.
- [10]殷群.电波牵连战士心——军中日记摘抄[A].中央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一册)[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263.
- [11]鹿野.陕北台记者生活回忆[A].中央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一册)[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25.
- [12]刘善本.飞向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地方[A].中央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一册)[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243.

The Ritualized Communication of the Early People’s Broadcasting

YANG Lu¹, JING Sheng-quan²

(1.Arts and Media College,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650000;
2.The Kindergarten Teachers College, Jiangyou, Sichuan 621709)

Abstract: The radio has great influence at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whole world. Though the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rts late, it breaks a new ground about the ritualized communication due to its connection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the public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Liberation War because of the fantastic power of cohesion. The ritualized production methods and reception practice have set an example for other ritualized communication ways, which has great value to research.

Key words: The Ritualized Communication; the People’s Broadcasting; Early Period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137页)

- [8]李从庆.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J].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eng Hai-l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Qiongtai Teachers College, Haikou, Hainan 571127)

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should be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platform for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teaching the language knowledge of English, teachers meanwhile ought to fully excavate the rich humanistic materials implicated in textbooks and penetrate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to improve students’ humanity accomplishmen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los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eachers could carry out humanistic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building happy and equal learning atmosphere, excavating deeply the humanistic materials in textbooks, and highligh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humanity accomplishment in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i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Humanistic Education; Learning Atmosphere; Humanistic Materials;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ies

(责任编辑:周锦鹤)